

甲午威海之戰中方戰略戰術評析

李嘉曾、李文馨*

2014 年是甲午年，兩個甲子即 120 年前發生的甲午海戰不僅令中國國土淪喪，而且也讓民族尊嚴受到極大挫傷。提升關於歷史教訓的思考不無必要。

發生於公元 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1 月至 2 月間的威海(衛)之戰，是中日甲午戰爭的關鍵戰役。這一戰役的結局直接導致了北洋海軍的覆滅和中國在整場戰爭中的徹底失敗。儘管威海之戰乃至甲午戰爭的勝負是由於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無法因人們的意願而轉移；但是，根據史料對中方當時採取的戰略戰術進行分析研究，有助於總結歷史經驗，對於吸取歷史教訓亦將大有裨益。

一、威海之戰的簡單回顧

威海之戰是中日甲午戰爭的組成部分。從時間順序上看，威海之戰屬於甲午戰爭第三階段的戰事，是在平壤之戰與黃海海戰(第一階段)、鴨綠江江防戰與金(州)旅(順口)之戰(第二階段)之後的收官之戰。該戰役的背景要從金旅之戰結束講起。

1894 年 11 月 22 日日軍攻佔旅順口，隨即在旅順屠城 4 天，兩萬餘中國居民遇難。中日甲午戰爭第二階段的戰事告一段落，戰局急轉直下，朝着不利於中國的形勢發展。

日本侵略者挾金旅之戰的餘威，妄圖乘勝佔領山東，進逼華北，遂根據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的建議，制定“山東半島作戰計劃”。又將大山岩大將指揮的第二軍第二師團與在國內的第六師團組成“山東作戰軍”，擔任主攻任務，兵員計 3 萬 5 千人。海上的聯合艦隊則擁有 25 艘主力艦和 15 艘魚雷艦。陸海兩軍配合作戰，實力相當雄厚。

清軍方面的兵力略佔下風。金旅之戰失敗後，北洋海軍的剩餘力量全部退守威海港，尚存各種艦艇 26 艘(一說 27 艘)。威海港南北兩岸建有大小炮台 23 座，配備各種大炮 160 餘門，共有 19 營軍士駐守，兵員將近 1 萬人。另外，在煙台、酒館(今牟平)、榮成等地還有 41 營守軍分散駐紮，兵員總數略超過 2 萬人。駐守山東的清軍總數在 3 萬人左右，但因威海和其他地方守軍分屬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山東巡撫李秉衡統轄，不易統一調度聯合作戰。

威海之戰的戰役進程主要由日軍榮成登陸、石家河前哨戰、南幫炮台保衛戰和劉公島保衛戰等戰事組成。¹

(一) 日軍榮成登陸

榮成灣位於山東半島最東端的成山角西南，灣口開闊，泥底而適宜船艦錨泊。日方以派出 3 艘巡洋艦佯攻登州作為掩護，其山東左佔軍第二師團 1.5 萬人，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 1 月 20 日)中午由聯合艦隊 19 艘軍艦護送至榮成灣。由於水淺軍艦無法靠岸，遂用駁船運送兵員和輜重上岸，次日方完成登陸。此後第六師團 1 萬人於 21 日到達，22 日登陸完畢；第三批日軍於 23 日到達並於當日登陸完畢。至此，日本侵略軍 3.5 萬人和 3,800 匹戰馬，在長達四天的時間內從容地在榮成灣一帶聚集。指揮官大山岩於 25 日到達榮成，坐鎮山東作戰軍指揮部，做好了攻打威海衛的準備。

(二) 石家河前哨戰

1 月 24 日，日軍主力兵分南北兩路從榮成出發，向威海進犯。上午 8 時 40 分，作為先頭部隊的偵查騎兵抵達距威海衛約 25 公里的石家河東岸。駐守石家河西岸的是山東巡撫李秉衡派出的陸軍分統總兵

* 前者為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後者為自由職業者

孫萬齡率領的部隊，包括高武左營一個營和福字三隊計約 1,200 人，其時駐守北幫炮台的陸軍統領戴宗騫派分統劉樹德率綏軍副、前、左三營兵士馳援防堵日軍，而從榮成西退的閩德勝部亦達到該地。三支部隊在橋頭集一帶設防。當日清軍在白馬村、湯家村、官莊村等多處與日軍接觸，雙方射擊交戰，使日軍稍有傷亡。清軍曾渡過石家河追擊日軍。綏軍統領戴宗騫次日報告曰：“昨劉樹德、孫萬齡進橋頭南十五里河西村，敗賊馬隊前鋒，小有斬獲。其大隊紮山上，日暮各罷。”²

石家河前哨戰是威海之戰中日雙方的首次遭遇，其結果是中方小勝。李鴻章獲報後曾作出肯定的評價：“初戰獲勝，稍壯士氣。”³

(三) 南幫炮台爭奪戰

經過數日休整，日軍從 1 月 29 日開始，陸續向威海灣南部聚集。威海戰區陸軍主將戴宗騫重新組織兵力佈防。“戴宗騫見日軍已逼近威海後路，仍懷信心，盡力佈置防守。根據現有力量，他一面派綏軍兩哨至虎山附近警戒，召回自橋頭集西撤之劉樹德兩營，並增撥一營；一面令鞏軍統領總兵劉超佩從鞏軍中、前兩營中挑選八百精兵，前往北虎口防守”⁴，做好了迎戰準備。

1 月 30 日凌晨，日軍分左右兩路縱隊進發。右路縱隊於七時半發動對南幫炮台制高點摩天嶺的總攻。駐守摩天嶺炮台的士兵在營官周家恩帶領下奮勇防守，短兵相接甚至展開肉搏戰，先後打退敵人三次進攻。最後守台將士全部壯烈犧牲，“壘內已無一兵一卒”⁵，日軍才佔領摩天嶺炮台。隨後日軍從摩天嶺向楊楓嶺發動進攻。營官陳萬青率眾與敵奮戰，中午時分因彈藥庫中彈爆炸而只得撤離炮台。此後，摩天嶺西北方向的龍廟嘴炮台因守將劉超佩受傷臨陣逃脫而失守，要塞百尺崖所、所前嶺炮台(小炮台)經過激戰，駐守的清軍將士幾乎全部戰死，也先後落入敵手，守將家屬還慘遭屠殺。威海灣南岸最後失陷的是皂埠嘴炮台。在敵軍陸海兩路夾攻的情況下，炮台守軍沉着應戰，不僅打退敵軍陸上進攻，還擊沉日艦一艘，最後因孤立無援終告失守。而日軍剛登上皂埠嘴炮台時，炮台便被海軍提督丁汝昌派至的魚雷艇管帶王平等敢死勇士用炸藥炸毀。“炮台突時坍塌，台上日兵飛入空中”；“巨石盤空下，當泊艦處墜水，激波入空際”。⁶ 在日軍攻佔摩天嶺炮台後不久，北洋旗艦定遠號等軍艦炮擊失陷後的炮台，將得意忘形到摩天嶺視察的日軍旅團長大寺安純少將擊斃，使其

成為“近代史上首個被中國軍人擊斃的日本將領”。⁷ 至當日傍晚時分，清軍駐守的威海灣南岸炮台全部失守，南幫炮台爭奪戰以日軍全勝告一段落。

在日軍右路縱隊進攻南幫炮台的同時，左路縱隊則從週邊向威海發動總攻。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之間，經過虎山、南北虎口、孫家灘等地的激戰，清軍大部分已經戰死或者潰散。2 月 1 日丁汝昌至北幫炮台與戴宗騫議商“戰守之策”時，“全台只剩十九人”。丁汝昌認為：“孤台不支，恐資敵用，我船及島將立見灰燼”⁸，戴宗騫表示：“危及之際，先毀台炮，不使資敵”。⁹ 於是招募勇士將北幫炮台與火炮、彈藥庫悉數炸毀。丁汝昌與此時已決意“惟有一死以報朝廷”的戴宗騫共同退守劉公島“定遠”艦。為信守自己“陸路北台均難存，是職道斃命時”¹⁰的諾言，戴於 2 月 2 日晚吞鴉片及金扣自盡。日軍順勢佔領北幫炮台，並於 2 月 2 日在威海衛會師。

(四) 劉公島保衛戰

劉公島位於威海灣口，距海岸最近處僅 2 海里許，是威海港的門戶。儘管面積才 3 平方公里多，但因位置和地勢關係，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888 年清政府即在劉公島設立北洋海軍提督府，還設有電報局、水師學堂、鐵碼頭等，是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北洋水師的誕生地¹¹，因而也是中日雙方必爭之地。威海之戰打響後，日軍始終將佔領劉公島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

就在 1 月 30 日日軍總攻南幫炮台當天的凌晨，日本聯合艦隊即發動了對劉公島的進攻。劉公島保衛戰共持續了 13 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歷時 5 天。此階段後期中方南北炮台皆失守，北洋海軍退至劉公島，日軍海陸夾攻使之陷入重圍。但北洋海軍在丁汝昌率領下奮力做最後拼搏，曾重創敵艦，打敗了敵人的進攻。第二階段從 2 月 4 日至 7 日，歷時 4 天。其間日本聯合艦隊採用海上進攻與魚雷偷襲相結合的戰術，在數次進攻中中方定遠、來遠等艦受魚雷攻擊或沉或損，中方魚雷艇則逃離戰場，與劉公島鄰近的日島炮台亦告失守，形勢十分危急。第三階段從 2 月 8 日至 11 日，歷時 4 天。日軍採用水陸夾攻、魚雷偷襲、持續圍困戰術，致使北洋海軍逐漸陷入彈盡糧絕的地步，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則自殺身亡。此時北洋海軍內部軍心失穩，任職軍中的洋人又積極勸降，丁汝昌在士兵“哀求生路”而獲知待援無望的情勢下表示：“吾誓以身殉，救此島民爾”¹²，終於 2 月 12

日晨服鴉片自盡。

幾乎就在丁汝昌自盡的同時，北洋海軍中的洋員與威海營務處候補道牛昶昞等商議向日軍投降事宜，鎮遠艦管帶楊用霖、劉公島護軍統領張文宣等先後自殺明志，最後假丁汝昌之名起草降書，加蓋北洋海軍提督印，向日軍聯合艦隊投降。2月14日下午，牛昶昞與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在《威海降約》上簽字，威海之戰以北洋海軍的覆滅和中方的徹底失敗而告終。2月17日下午，原中方鎮遠等十艘軍艦被編入日本艦隊，康濟艦則載着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戴宗騫、沈壽昌、黃祖蓮的6具靈柩，以及投降後得以生還的陸海軍將士和洋員，“淒然離開威海衛港，向煙台港駛去”。¹³

二、中方戰略思想的變化及其後果

威海之戰中方徹底戰敗是無法更改的歷史事實。許多研究者認為，中方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是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考察中方從甲午戰爭開戰以來的戰略思想，其實也並不是自始至終一味消極抗敵、被動防禦的。大致可以看出中方在戰爭發展過程中前後不同、自相矛盾的轉變過程。

(一) 由“主戰”向“主和”轉變——最高決策決定對外關係基調

甲午戰爭前後，中方的最高決策權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手中。雖然19世紀中葉的兩次鴉片戰爭導致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來華掠奪，但清代咸豐之後慈禧太后當政，整飭吏治，啟用漢臣，在鞏固封建統治的基礎上發展工商業，特別是支持洋務派開展洋務運動。一時經濟有所發展，軍事力量也有所提升，史稱“同治中興”。¹⁴其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最高統治者自我感覺頗好，在處理與外國的關係上並非一味退讓求和，特別是在遇到外敵入侵時，往往首先表現出“主戰”的態度。例如，1871年俄國佔領新疆伊犁地區，後來慈禧採納左宗棠的意見主動出兵，直至收復新疆。

然而，滿清最高統治者的“主戰”只是曇花一現的念頭。一旦在現實中受到挫折，他們很快就會暴露出虛弱的本質，向相反的方面轉變。例如，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左宗棠、張之洞等主戰，朝廷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1884年8月23日，法國軍艦向福建水師發動突然襲擊，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慈禧諭令對

法宣戰，並將繼續堅持和議的張蔭桓等6位總理衙門大臣革職。¹⁵戰爭過程中雙方各有勝負(中方的勝利有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捷等)，但主和派李鴻章等的主張“乘勝即收”被最高決策者採納，主戰思想終被主和思想所替代。1885年2月，法軍攻佔諒山，慈禧即轉向主和，後來甚至簽訂了承認法國對越南保護權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甲午戰爭同樣如此，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初，清廷態度也比較明確也比較一致，“光緒主戰，慈禧亦主戰”。¹⁶當時“中外輿論認為，中國必勝”。¹⁷“在戰爭爆發之前和戰爭進行的初期，當時報刊的輿論，對這次戰爭頗具必勝的信心。《申報》光緒二十年元月初九、初十、二十一日發表的《戰必勝說》、《論日本之謀朝鮮將為俄人所誤》、《論中國之兵可勝日本》等評論文章，都認為中日戰爭中國必勝，日本必敗”。¹⁸隨着戰爭的進程與中方的連續失敗，慈禧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為了不影響自己的六旬大慶典，慈禧希望外國出面干涉，盡快結束戰爭。她支持李鴻章的避戰求和的方針，以各種藉口，打擊以光緒為首的主戰派”。¹⁹慈禧太后竟然在甲午戰爭爆發後“重新啟用1884年被她罷黜的恭親王奕訢主持總理衙門”，“請求英國聯合美國和俄國共同調停中日戰爭”，甚至派員“赴日求和”。²⁰

最高決策決定對外關係基調。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廷最高統治者對日(對外敵)的戰略思想由“主戰”向“主和”的轉變，決定了中國在以甲午戰爭為焦點的對外關係中必定處於被動地位。

(二) 由“自強”向“示弱”轉變——對敵心態決定戰爭走向

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年，清政府遭受了至少5次侵略戰爭：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身居要位後的慈禧太后經歷了其中後面的4次，她對侵略戰爭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大敵當前情勢下的複雜心態。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慈禧已是咸豐帝的懿貴妃。1860年9月，“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咸豐決定逃往熱河避暑山莊。當咸豐即將出發的時候，懿貴妃極力諫阻，請求咸豐留在北京，繼續抵抗”。²¹甚至在與英法聯軍簽署《北京條約》後，懿貴妃還“深以為恥，勸咸豐廢約再戰”。²²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初，慈禧支持光緒的主戰思想，而且“不僅戰前她表示對日本的挑釁不准示弱，而且戰爭爆發以後，她仍然對前

敵的抗戰作出積極支援的態度”。²³ 光緒皇帝也是態度鮮明，針對日本突襲朝鮮挑起戰爭的事件，他在對日宣戰詔書中表示：“着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獅，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²⁴ 可見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慈禧為代表的清政府起初還是堅持“自強”態度的。

隨着中方戰敗和戰局向不利的方向發展，清政府的態度便急轉直下。慈禧太后急於請英、美、俄、德等國出面調停，甚至不惜代價停戰求和。1984年11月3日，恭親王奕訢向美國政府提出請求：“請根據天津條約(第一款)對中、日兩國進行斡旋”²⁵，次日他又約見美、英、德、法、俄等國公使，要求各國政府會同干涉。但因西方各國態度不一，而“日本政府謝絕了一切干涉的建議”²⁶，故最終未能如願。但是，不敢與侵略者針鋒相對卻尋求協力廠商出面調停，恰恰暴露了清政府的示弱心態。正是這種“示弱”的心態，從根本上瓦解了中國軍民的鬥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甲午戰爭後期幾乎一邊倒的走向。

(三) 由“積極防禦”向“消極防禦”轉變——戰略思想決定戰役勝負

甲午戰爭是日方挑起的侵略戰爭，中方始終處於防禦地位。但防禦也有積極和消極之分，在這個問題上，初期中方的戰略思想尚有積極的成分在內，但逐漸被消極的思想所取代，釀成了一味被動挨打的悲劇。

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帝國於1894年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發出宣戰詔書，義正詞嚴地指責日本“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鳴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詔書中不僅命李鴻章迅速派兵進剿，而且要求“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²⁷ “進剿”和“迎頭痛擊”、“毋得稍有退縮”等詞句顯然反映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而在實戰中，清軍一些將領確實在努力遵照執行。例如，1894年9月17日黃海大海戰爆發，當中日雙方艦隊在海中對峙時，是中方的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首先開炮，帶動各艦一起向敵艦轟擊的。可見在甲午戰爭初期中方的防禦戰略還是比較積極的。

然而，李鴻章的防禦思想則是比較消極被動的。“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²⁸是李鴻章貫穿始終的指導思想。甲午戰爭第一階段開始後不久的8月23日，李鴻章即“上書光

緒，建議採取‘保船制敵之方’。他認為中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²⁹；他還主張中國海軍不必與日本海軍“拚擊”。8月31日，光緒即肯定了李鴻章的“嚴防威旅門戶，為保船制敵之計”。許多研究者指出，“放棄爭奪黃海制海權，嚴防威旅門戶，保船制敵。這就既使援朝陸軍陷於孤立，又把戰火引進北洋沿岸，顯然是一大失策。”³⁰ 而“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甲午海戰中(註：尤指威海之戰中)，北洋海軍消極避戰，一味的‘保船制敵’，艦隊自始至終都未發起一次主動進攻，艦隊的進攻性和靈活性受到抑制……導致海戰一敗塗地”。³¹

綜上所述，在甲午戰爭的威海海戰中，中方因最高統治者的決策由“主戰”逐漸向“主和”轉變，對敵心態由“自強”逐漸向“示弱”轉變，戰略思想由“積極防禦”逐漸向“消極防禦”轉變，最終導致本次戰役乃至整場戰爭的徹底失敗。

三、中方兩種戰術之對比：“固守”還是“迎剿”？

回顧威海之戰前後中方有關指揮員和決策者的言行，不難看出面對不可避免的這場中日對決，清軍指揮員中曾經產生過兩種不同的戰術方針：“固守”，還是“迎剿”？

(一) 初期產生的“固守”戰術

大敵當前之時，考慮到敵我雙方的兵力對比和前期戰局的發展態勢，中方比較自然地想到了“固守”待援的戰術。

這一戰術據說起初是當時北洋海軍的指揮官提督丁汝昌和駐守威海陸軍的指揮官道員戴宗騫的共識。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七日(1894年11月14日)，丁汝昌以他和戴宗騫的名義致電身居津海關道、總理後路轉運等後勤要職的盛宣懷，闡述了具體想法：“昌自旅(順)回威(海)，與宗騫熟商……封河後寇必改犯海南石鈞島，遇北風易登岸。威十一營只能守近島，不能遠剿百餘里外”；“以大事論，鼎臣八營實應留顧威南……汝昌、宗騫”。³²

這一想法符合李鴻章的觀點。他在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一(1894年11月27日)致電威海駐軍主要將領時強調：“諸將領等各有守台之責，若人逃台失，無論逃至何處，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卻敵，定請破格獎賞”；“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³³ 為

執行這一戰術，李鴻章指示：“多儲糧藥，多埋地雷，多掘地溝為要”³⁴；丁汝昌則積極執行這一戰術：“丁議……擇要築行炮土台，多掘溝道，以備設防，避敵槍炮”。³⁵當時在定遠號當水手的英國士兵泰萊曾經見證了丁汝昌的做法：“丁提督召諸管帶會議(此等會議予從未被召參與)議決對登岸之敵人不加阻止，海軍當留為保護港口之用”。³⁶

然而，隨着戰場形勢的發展變化，上述戰術暴露出不少弱點，因而催生出與之不同的另一種戰術方針。

(二) 後期形成的“迎剿”戰術

1. 迎剿戰術的由來

迎剿入侵之敵的戰術設想，是威海地區陸軍的最高指揮官、駐守威海北幫炮台的統領戴宗騫首先提出來的。李鴻章在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一(1894年11月27日)致威海駐軍主要將領強調“固守”方針的電報中，已經透露了戴宗騫的這一不同想法：“戴道欲率行隊往岸遠處迎剿”³⁷，但表示不予贊同。在三天後的十一月初四日(1894年11月30日)，戴宗騫向李鴻章明確闡述了提出這一戰術的依據和具體做法：“(炮)台勢依山，前高後低，專避擊防之用，若自後來犯，藥單等庫，皆孤露無藏，頗不易固。昨英船見倭欲在龍門港下岸，距威百四十里。宗騫亦知遠剿甚難，但鑒於旅、灣不迎擊之失，株守必無全理。已抽調行隊，戰守各專責成。與孫鎮(萬齡)約商，聞警馳援，並力一戰，必不偷生苟活”。³⁸丁汝昌在同一天向李鴻章報告：“戴道意，敵無論何處登岸，以抽綏鞏軍馳往剿捕為重……臨時不可抽隊遠去……應請電飭叮囑，用堅至計。”³⁹可惜的是這一新想法次日(十一月初五日)便受到李鴻章反對：“戴道請抽行隊赴遠迎剿，我極不謂然，曾經申斥”。⁴⁰可見此時戴宗騫已經下定了迎剿日寇的決心。十一月初六日(1894年12月2日)，戴宗騫致電李鴻章，對迎剿戰術思想作出了比較詳細的闡述：“宗騫鑒於大連灣守兵不並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故欲約會嵩軍、福營截其上岸，縱不能及半渡，尚可進扼上莊山口，隨通威煙電信，局勢尚不過與逼促……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總之，一拼比較略有所濟”。⁴¹迎剿戰術的由來與反響大致如此。

事實勝於雄辯。戰事逐漸吃緊，隨着旅順的失守，有倭寇已在龍鬚島上岸，清軍固守的戰術方針逐漸暴露出不可避免的缺陷，不少人開始贊同迎剿的戰術設想。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4年12月

25日)，盛宣懷在給丁汝昌等人的電報中表明自己的看法：“(倭人)取威必從背攻，將以榮成各海口為皮子窩。一經大隊上岸，便難抵禦，若在海邊防守，數千人可退敵。”⁴²甚至連光緒皇帝都對株守戰術提出質疑，指示要“相機迎擊”。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13日)和十二月二十日(1895年1月15日)，李鴻章接連兩次向下屬發出電報，傳達光緒的指示：“若遇敵船逼近，株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應如何設法調度，相機迎擊，以免坐困”⁴³；“應如何設法相機迎擊，着悉心籌酌”。⁴⁴光緒的諭旨想必具有權威性，“在嚴峻的事實面前，李鴻章很快就改變自己原來的看法，轉而支持戴宗騫派出守台軍隊赴遠處迎剿登陸日軍的主張”。⁴⁵

2. 迎剿戰術的實施

從上文的回顧可知，迎剿戰術的形成頗費周折，待到李鴻章等接受這一方針時，威海之戰已經爆發，形勢急轉直下。但是，儘管清軍回天乏力，畢竟還有實施迎剿戰術、抓住最後機遇的可能。

迎剿戰術的實施主要體現在這一戰術的宣導者戴宗騫身上。首先是對迎剿方針的堅持。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軍從榮成灣登陸後，戴宗騫更下定迎剿的決心。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給兩江總督張之洞的電報中表明心跡：“倭廿五距榮成，一二日必犯威……今忽攻南路，從前佈置，全落空際……職道擬抽隊與東軍並力拼戰，明知孤注，然捨此坐以待困，亦難久支。因蒙垂廩，用感瀆陳，曷勝悚迫。”⁴⁶

在實戰中，戴宗騫確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施了迎剿戰術。上文在回顧威海戰役進程時已經述及，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5年1月24日)，當日軍在榮成登陸後分兩路進犯威海時，戴宗騫即派出分統劉樹德率綏軍副、前、左三營兵士馳援防堵日軍，並與駐守石家河西岸的孫萬齡部、從榮成西退的閆德勝部會合，與日軍接觸交戰，使日軍稍有傷亡，“敗賊馬隊前鋒”而“小有斬獲”。在其後的南幫炮台爭奪戰中，戴宗騫不僅固守自己負責的北幫炮台，同樣派兵出戰南岸。“自倭登岸後，綏四營全赴南岸，苦戰十日，並無接應”⁴⁷，直至最後戰敗而為國捐軀，迎剿戰術亦隨之告終。

四、結語：歷史的遺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日之中國人之所以用各

種方式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正是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用以指導今後的實踐。當我們對威海之戰以及中方的戰略戰術進行了簡單的回顧之後，不難認識到需要吸取足夠的教訓，學會正確處理好以下問題以彌補歷史的遺憾：

第一，必然與偶然的辯證關係。必然是客觀規律的反映，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趨勢。一百二十多年前，由中日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社會領域的諸多因素所決定，甲午戰爭以中方失敗而告終或許正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以哪一場戰役、以甚麼樣的方式告終卻是一種偶然。具體言之，甲午戰爭未必只應當以威海之戰作為最後失敗的絕唱。假如中方在威海之戰有出色一點的表現，或許就能延長戰爭的進程，改變勝負的最終對比，在一定程度上對既定的歷史趨勢作出適當的改寫。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並沒有出現，這不能不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第二，戰略與戰術的辯證關係。儘管我們贊同“戰略思想決定戰役勝負”的觀點，但並不否認戰術方針對於具體戰鬥甚至局部戰役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甚至有可能改變整場戰爭的進程。假如當初迎剿的戰術得以早日形成共識並付諸實施，日軍就不可能在長達四天的時間內於榮成灣從容登陸，也難以在短期內聚集起足夠的力量進犯威海，這樣整場戰役的進程和結局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改寫。威海之戰中方關於“固守”還是“迎剿”的兩種戰術之爭，既使我們認識到清軍指揮員中確有將才，又讓後人為正確的戰術未能被採納而感到惋惜。歷史是不能假

設的，但是我們應當承認歷史存在遺憾，更要為歷史的遺憾總結足夠的經驗與教訓。

第三，對歷史人物的科學評價。威海之戰的戰術之爭主要涉及兩個歷史人物：丁汝昌和戴宗騫。這兩位人物具有不少共同之處：在甲午戰爭之前都為治軍治國做出過一定貢獻，在甲午戰爭期間都有盡忠盡職的表現，最後也都以自盡的方式殉國。但關於他們的評價卻一波三折。丁汝昌生前即遭革職等處罰，死後仍長期“帶罪在身”，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愛國將領”，歌頌他“以死報國”；也有人罵他“無才無德”、“畏敵避戰”，甚至指責他“已降復死”。⁴⁸ 至於戴宗騫，受到的不公正評價更為突出。儘管史料中對他“興辦畿輔水利”、“吉林屯墾”、“督辦威海防務”⁴⁹等事蹟有所涉獵；但也有更多的人對他橫加“壓餉”、“侵吞兵餉”、“逃將”、“貪生怕死”等指責，甚至斥責“甲午戰爭期間戴宗騫和丁汝昌鬧不和，致使龍廟嘴炮台失守，造成威海戰役失敗的嚴重後果”。⁵⁰ 研究表明，戴宗騫作為“善長詩文的正氣之士”、“誠信忠孝的道德之士”、“文武兼備的治軍將才”和“戀恩報國的忠烈之士”⁵¹的真實面貌尚未被廣大民眾所知曉。烈士早已長眠地下，身後卻仍要蒙受莫須有的污名，這更是一個莫大的歷史遺憾。願以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評析威海之戰中方戰略戰術為契機，對戴宗騫、丁汝昌等歷史人物作出公正評價，還歷史以真面目，彌補歷史的遺憾，兼以告慰為國捐軀的甲午英烈。

註釋：

- ¹ 根據陳悅：《甲午戰爭中“白馬河之戰”史實考》、戚其章：《甲午戰爭史》、百度百科詞條“威海之戰”、維基百科詞條“威海衛之戰”、百度百科詞條“中日甲午戰爭”、百度百科詞條“白馬河之戰”等資料匯編。
- ² 轉引自陳悅：《甲午戰爭中“白馬河之戰”史實考》，載於《大連近代史研究》第五卷，2008年，第128-140頁。
- ³ 李鴻章：《北洋大臣來電》，載於《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2356)，第29卷，第40頁。
- ⁴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⁵ 小川真一制版：《日清戰爭實記》，明治二十八年七月版，第20編，第28頁。
- ⁶ 轉引自註4。
- ⁷ “大寺安純”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年9月15日。
- ⁸ 同註3，第16頁。
- ⁹ 李鴻章：《奏請優恤力竭自盡之戴宗騫片》，載於《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2635)，《中日戰爭》叢刊三，第441頁。
- ¹⁰ 李鴻章：《寄譯署》，載於《李鴻章全集》電稿三，第396頁；《中日戰爭》叢刊三，第357頁。
- ¹¹ “劉公島”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年9月15日。

- ¹² 陳詩：《丁汝昌轉》，見《廬江文獻初編》(安徽省博物館藏)。
- ¹³ 同註 4。
- ¹⁴ “慈禧太后”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年9月15日。
- ¹⁵ 同上註。
- ¹⁶ 同上註。
- ¹⁷ 同上註。
- ¹⁸ 龔書鐸：《甲午戰爭期間的社會輿論》，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05期。
- ¹⁹ 同註 14
- ²⁰ “中日甲午戰爭”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年9月15日。
- ²¹ 同註 14。
- ²² 同上註。
- ²³ 《戚其章：甲午和戰之爭再探討》，載於新浪軍事：<http://jczs.news.sina.com.cn/2004-09-16/2331227829.html>，2014年9月15日
- ²⁴ 光緒皇帝：《上諭》，載於《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1289)，第16卷，第2-3頁。
- ²⁵ 《田貝致葛禮山電》，載於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39頁。
- ²⁶ 轉引自孫丹：《談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邀請西方國家調停始末》，載於《科教導刊》(電子版)，2013年第7期(中)。
- ²⁷ “大清光緒皇帝宣戰諭旨”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年9月15日。
- ²⁸ 轉引自靳天宇：《甲午海戰對中國海軍的歷史啟示》，載於《軍事學術》，2013年第10期。
- ²⁹ 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³⁰ 同上註。
- ³¹ 同註 28。
- ³² 《戴宗騫、丁汝昌致盛宣懷》，載於戚俊傑編校：《丁汝昌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51頁。
- ³³ 李鴻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劉鎮、張鎮》，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9頁。
- ³⁴ 同上註。
- ³⁵ 李鴻章：《寄丁提督、戴道(宗騫)》，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頁。
- ³⁶ 秦萊：《甲午中日戰爭見聞》，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叢刊：中日戰爭(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頁。
- ³⁷ 同註 31。
- ³⁸ 戴宗騫：《致李鴻章》，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9頁。
- ³⁹ 丁汝昌：《致李鴻章》，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頁。
- ⁴⁰ 同註 35。
- ⁴¹ 同註 38，第238頁。
- ⁴² 盛宣懷：《致威海劉公島丁軍門、張統領、李撫憲、孫軍門、劉觀察電》，載於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1頁。
- ⁴³ 李鴻章：《寄劉公島丁提督劉鎮》，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5頁。
- ⁴⁴ 李鴻章：《寄譯署》，載於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7頁。
- ⁴⁵ 廖宗麟：《戴宗騫和甲午威海之役》，載於《安徽史學》，1984年第06期。
- ⁴⁶ 戴宗騫：《致張之洞》，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五)，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第58-59頁。

⁴⁷ 同註 44，第 395 頁。

⁴⁸ “丁汝昌”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 年 9 月 15 日。

⁴⁹ “戴宗騫”詞條，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2014 年 9 月 15 日。

⁵⁰ 引自根松巧尢：《告慰甲午之戰英烈》，載於：<http://club.fjdh.com/html/69/5369-214936.html>。

⁵¹ 李文馨、李嘉曾、汪家鼎：《從周馥三篇詩文談對戴宗騫的歷史評價》，發表於“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威海，2014 年 9 月。